

蒋满霖◎著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 制度创新研究

ZHONGGUO NONGCUN
JINRONG SHENGTAI YOUHUA DE
ZHIDU CHUANGXIN YANJI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 制度创新研究

蒋满霖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 蒋满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43-1242-8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农村金融—经济制度—
研究—中国 IV. ①F83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864 号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蒋满霖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邹蕊 |
| 封面设计 | 原谋书装 |
| 出版发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
| 发行部电话 |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
| 邮政编码 | 610031 |
| 网 址 | http://press.swjtu.edu.cn |
| 印 刷 |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
| 成品尺寸 | 146 mm×208 mm |
| 印 张 | 8.375 |
| 字 数 | 232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43-1242-8 |
| 定 价 | 25.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言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温总理曾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表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农村建设核心的“三农”问题在正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之中的中国仍然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四次大的变迁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作为旨在破解“三农”的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关键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事实上，新农村建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文明，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文明。这些内在要求与本书界定的农村金融生态的本质是一致的，只不过“三农”是问题的起点，农村金融生态是手段，新农村建设是目标。因此，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最有效途径。那么该如何优化？在制度长期相对缺陷的中国来说，必须要依赖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促成的几次农业大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非大量经济投入，而是制度创新。由此，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构建制度创新框架诱导农村金融生态的优化。

本书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背景，试图从学科前沿构建全新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农村金融生态”，摈弃目前大多数的“金融生态”加“农村”就是农村金融生态的研究模式，甚至为颇受指责的农村金融“平反”。为此，本书原创性地从农村金融主体群落、农村经济主体群落和农村金融生态生境三个维度设计一个动态的揭示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金融内在机理的农村金融生态的“金字塔三分图”。这是在新的逻辑起点上构建一个全新的逻辑体系。为此，

本书以“金字塔三分图”为主线，分三大部分论述。第一部分是分析基础，包括第一、二、三章，侧重于构建新的农村金融生态的逻辑体系。第二部分是分析过程，包括第四、五章，选择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农业大省——安徽进行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第三部分是分析结果，包括第六、七章。从分析看，制度是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原动力。在对农村金融生态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农村经济等配套制度和生境的核心制度（主导因子）来构建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制度创新框架。

全书以独特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诠释“农村金融生态”，通过制度创新框架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旨在为破解“三农”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书中原创性地给出了一个较科学的，包括观点、方法和政策的农村金融生态的理论框架。创新意味风险，本书也许不够精致，但至少为新农村建设途径的研究独辟蹊径。

当然，在中国，研究“三农”永不过时。从国外实践看，“三农”也长期存在过。国外政府都不遗余力在完善制度的前提下，对“三农”进行扶持，农村金融几乎就是“政策性金融”。当然，国外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借鉴，但他们对“三农”的“偏爱”态度和对城乡平等的尊重，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同时，农村金融生态质量是可以评价的。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诱导性的制度创新框架应该有一定的差异性。金融制度和农村制度仅仅是配套制度，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的核心制度框架（农村金融生态的主导因子）才是生境制度。其实，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层面的文化。在中国，对于政府来说，应该从思想深处尊重城乡的平等性。同时，在全社会积累出城乡平等的价值观。

我们将“农村金融生态”的概念通过本书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对于农村金融生态的概念、实践有所认识和启发，从而一起推动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工作。

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罗剑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张永升博士、安徽工业大学李致平教授、柳州市司法局王彪硕士、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余秋平教授、宋瑞敏教授等关心与支持我的师长和好友。当然，本书引用了很多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的诸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谢谢。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让我看的更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所有这些衷心的感谢只能化作我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动力，不断前进。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或讨论。作者的联系方式为：蒋满霖，jiangmanlin@126.com。

作 者

2012 年初春

目 录

1	导 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6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8
1.4	研究思路	15
1.5	创新之处	15
2	农村金融生态的理论创新框架	17
2.1	新农村建设理论	17
2.2	农村金融生态理论创新——“金字塔三分图”	19
2.3	农村金融生态的核心是制度	30
3	国外相关实践的启示	33
3.1	农村建设的模式	33
3.2	农村金融制度	36
3.3	政府行为	44
3.4	对中国的启示	48
4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分析	50
4.1	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50
4.2	“显性”的农村金融主体群落现状分析	57
4.3	“半显性”的农村经济主体群落现状分析	122
4.4	“隐性”的农村金融生态生境现状分析	159
4.5	低水平均衡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性根源	176
5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实证分析	180
5.1	国内代表性实证案例的剖析	181
5.2	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	187

5.3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指标体系的设计	192
5.4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实证——以安徽为个案	195
6	农村金融生态优化的制度创新框架	219
6.1	实现功能性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219
6.2	促进物种多元化的农村经济制度创新	228
6.3	构建高水平均衡的农村金融生态生境的制度创新	234
6.4	东、中和西部制度创新的差异性	244
7	结束语	245
7.1	研究的几点主要结论	245
7.2	研究的不足	246
7.3	进一步的思考	247
	参考文献	248

1 导 论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我国一直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和城乡差别的发展战略，农业被安排承担起了原始积累的重任，农民被限制在农村里、土地上，终于渐渐形成了“三农”这个今天无法回避的超越经济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三弱”问题（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地”这一“新三农”问题。怎样解决这千百年来的难题？毕竟，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1.1 研究背景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温家宝总理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表达他对“三农”的关切之情。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进而向城市推进。中国农村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持续快速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人均收入提高35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增收难，农业基础薄弱，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已经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9年的3.35:1）。应该说，我国政府一直关注“三农”，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率先提出应对农村进行改革，以解决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吃饭问题。2011年的以促进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

号文件”又是“三农”^①。这到底为什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见表1.1），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来诠释“三农”。

表 1.1 中国“三农”问题的外延

农民问题	农村问题	农业问题	粮食问题、农业竞争力问题、产业化问题等
		其他问题	小城镇建设问题、村民自治问题、乡镇政权调整问题、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农民税费改革问题等
	其他问题	土地产权界定与保护问题、精神文明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扶贫问题、户籍改革与农民流动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新农村医疗保险问题、农民人力资源问题等	

早在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新农村的重大战略，这从根本上为解决“三农”指明了方向，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2008 年 10 月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整个农村制度改革新起点。当然，在今天，新农村建设核心的“三农”还处在艰难的“爬

① 198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总结，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分。1983 年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 年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 年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 30 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收购的新政策。1986 年第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2004 年第六个“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 年第七个“一号文件”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强化各项支农政策。2006 年第八个“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 年第九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 年第十个“一号文件”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2009 年第十一个“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2010 年第十二个“一号文件”是《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坡阶段”^①，社会基尼系数也在扩大，见表 1.2。“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美好的 20 个字，是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距此目标还有多远？^②

表 1.2 1981—2007 年中国基尼系数

年度	基尼系数	年度	基尼系数	年度	基尼系数
1981	0.273	1998	0.350	2005	0.442
1990	0.316	2000	0.383	2006	0.437
1995	0.376	2001	0.395	2007	0.437

资料来源：刘振林. 论收入差异与分配和谐. 财政研究, 2009 (3).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和谐发展。所以说，新农村建设虽然在农村，但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农民，它有巨大的正向的外部效应。其实这就是中国农村第五次制度变革^③。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破解“三农”，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

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中国，作为多功能的农业，几乎被单一化为产业部门，于是不得不走上与二、三产业同台打擂的困局，从而导致了农民成

- ① 胡锦涛总书记 2007 年在省部级干部新农村建设专题会上所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三农”问题，是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对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继承和创新。解决“三农”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② 由于大量青壮年民工进入城市，造成他们的孩子、爱人、父母继续留在农村老家经营土地，珍贵的土地资源被抛荒，留给世人是一种萧条景象！让人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制定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规划，如执行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等措施都给予了广大农民实实在在的支持。但这远远不够，农村经济社会要发展，必须解决“造血功能”问题。
- 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制度有了四次大的变迁。每一次变迁都对产生巨大影响。第一次制度变迁：土地革命。这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中国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清除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障碍。第二次制度变迁：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第三次制度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其最大的绩效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这整个中国改革的起点。第四次制度变迁：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实现了在分户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为弱者,农村成为弱势,农业成为弱质。^①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粮食的第一属性是生存必需品;第二是战略品;第三是国家公共产品。这对于拥有13亿之众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农业贡献已不仅仅限于人们常常提及的经济贡献,实际上农业贡献已体现到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之中。^②当然,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以自然萎缩直至消融的消极方式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自然而消极的方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人口巨大的中国,如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说:“一个农民占50%的国家和一个农业劳动者占人口10%的国家当然有本质的不同。”^③

应该说“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当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时,农业与农民产生了联系,同样的,当农民作为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农村与农民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农业和农村是作为农民生存的具体载体的附着其上的次生性问题。因此,仅仅用经济眼光难以发现中国“三农”的根源,而这更多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综合体。基于此,本书拟原创性地对现有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创新,并结合“新农村建设”构建一个全新的逻辑体系,以完善现行的农村金融理论。

那么,农村金融生态是什么?农村金融生态的内涵绝不是在“金融生态”前面加上“农村”,它更多的是农村地区金融、经济、政治

① 农村金融更多是政策性的。曾建中(2006)研究认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向着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方向推进的,其结果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明显趋于减弱,农村金融主体供给不足。

② 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提出的“稻米文化”:认为日本文化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提出了水稻种植的文化等功能。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正式采用了农业多功能性提法。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考虑农业的多功能特点,促进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在马斯特里赫特专门召开了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性会议;同年,日本颁布了《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发挥农业多功能作用的新概念,强调农业除具有经济功能外,同时还具有社会功能、生态功能 and 政治功能等多种功能。具体见高林英:《论农业的多功能性及其价值》,《理论前沿》,2008(23)。

③ [法]H.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和文化的综合系统和制度集合。

事实上,破解“三农”,建设新农村的途径很多。但是,至少目前看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作为勾勒新农村建设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工具的农村金融生态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农村“资金洼地”问题,更多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进而,这就基本上体现了其精髓和“新型农民、发达农业、和谐农村”的内涵。这也是对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业发展为中心,农民富裕为目的”的“三农”思想最好的诠释。从逻辑上看,新农村建设和笔者拟从“农村金融群落、农村经济群落和农村金融生态生境”上构建的农村金融生态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同时,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体现的是在中国农村高水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生态严重失衡,与建设新农村的目标极不协调。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生态,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实现农村金融、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优化农村金融生态势在必行,也是解决“三农”的瓶颈。

当然,经济、法律和道德几乎是构成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促成几次农业大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非大量的经济投入,而是制度创新。在今天,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固然重要,但这种支持更应体现在对农政策的松绑和制度的创新上。因此,农村金融生态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创新。^①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明确地指出:制度重于技术。^②

构建一个良性、动态的农村金融生态的目的是化解农村金融风

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② 吴敬琏. 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险,提高农村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在解决“三农”的过程中实现建设新农村伟大战略的终极目标。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正如背景分析,“三农”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中国政府拟用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去完成对“三农”的破解。关键是,新农村如何建?因此,本书涉足的是利用农村金融生态的优化去建设新农村这个全新的而又迫在眉睫的理论与现实的课题。

1.2.1 研究目的

自从金融生态概念在中国产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蜂拥而至,甚至表现为狂热。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理性的研究态度。目前,在农村经济领域,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生态这个基本的问题也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使得目前的农村金融生态的研究陷入一种简单的重复。因此,本书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理论上回答最简单的“农村金融生态是什么”的问题。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去回答“农村金融生态怎么样”的问题,进而在实践上回答“农村金融生态为什么”的问题。这种全新的理论逻辑体系为破解“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

1.2.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1) 鲜有现成的新农村建设视角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理论。应该说,国际上金融学理论的两大流派鲜有涉及农村金融生态。目前,国际上金融学发展的两大流派:一是传统经济学院的金融学模式,

又叫金融机构理论,以米什金教授为代表的,从宏观经济学来审视、研究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传导机制;二是商学院模式,又叫金融功能理论,以博迪和默顿为代表,是以微观金融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虽然,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目前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偏重机构而轻功能的实践,但无法去诠释课题涉及的研究范围。因此,本课题创新性的提出“新农村建设”“三农”“农村金融生态”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农村金融主体群落、农村经济主体群落和农村金融生态生境三个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农村金融生态的“金字塔三分图”。课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目前的农村金融学理论、农业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内涵,拓展了这些理论的外延。

(2) 国情决定了构建与新农村建设配套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创新具有特色。完善的制度作为前提,西方的金融模式一般是从管制向放松转变,并不涉及制度改变。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的是制度的路径选择,如中国金融的产权制度^①。在中国,启动落后的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无需赘述,但这又和城市金融改革不尽相同。现有的理论无法去指导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金融生态(工具)的制度创新。

(3) 突破用传统金融模式研究农村金融的理论范式。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习惯使用“用机构金融理论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的理论范式”,这种研究在多年的“三农”实践中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现有的、流行的农村金融逻辑的局限决定了必须创建一个全新的逻辑。论文创新性地从“金字塔结构”去诠释农村金融生态理论,突破了现有研究范式,这些理论创新可以更好地指导新农村建设。

2. 现实意义

(1) 农村金融生态构建的实践意义。农村金融生态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① 中国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缺陷还比较多,最关键的是产权制度,如中国政府在银行中的产权比例达到 96.5%,英美两国政府在银行中没有所有权,德国的比例为 42%,主要新兴国家如印度在银行中拥有的所有权比例为 80%,巴西为 51.5%。如此高的国有产权比率是中国金融低效的关键原因。

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目标。同时,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可以反映出一个农村地区社会的诚信水平,是建设乡风文明、诚信农村的强大动力。当然,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特征是法律政策透明、个人和企业信用好、金融债权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这可以吸引外部资金,形成“资金洼地”,弥补农村地区建设中的资金不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对做大做强农村金融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和壮大同样需要有良好的环境与之相匹配,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良好的企业和个人信用,透明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可以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将可能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优化中国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2)可以有效分类指导新农村建设与破解“三农”问题。本书根据“金字塔三分图”的理论框架设计的逻辑性强的指标体系与实证方法对于中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和破解“三农”具有可行的实践意义。本书提出的优化金融生态的制度创新,对于各级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来说也具有很好的决策参考意义。

因此,研究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创新框架更是中国的一项紧迫和艰巨的任务,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由此,为“三农”的解决提供切实可行且成本较低的思路,从而有利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政治等的稳定和发展。

本书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通过构建一个新的逻辑体系,为中国的农村金融生态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实践样本,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大抵也在此。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农村建设、金融生态的研究较少,特别是金融生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在外国研究更少。在国内,相比较而言,对于农村金融生态的研究也是很

少的。在这里，笔者对于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综述和简评，以寻找本书的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

1.3.1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研究中，几乎还没有出现“金融生态”(Financial Ecology)这个概念。当然，国外学者曾经提出过用生态学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如经济生态学。生态学概念是德国动物学家 E. Haeckle 在 1866 年首先提出的。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 Mckenzie 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这个名词。英国生态学家 A. G. Tansley 于 1935 年创立生态系统学，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展开研究的是美国海洋生物学社的 Rachel Carson。她于 1962 年发表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对美国滥用杀虫剂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揭示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 Kenneth Boulding 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全球出现了一大批生态经济学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学者加博的《跨越浪费的时代》、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编的《60 亿人——人口困境与世界对策》、朱利安·西蒙(G. Sinmous)的《最后的资源》。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的现实需要以及工程系统科学向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渗透，一大批论述经济生态问题的著作相继问世。

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从制度角度进行研究。Ross Levine (1998) 提到法律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产生的结果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用数据实证了作为金融媒介的外生变量——法律和调整的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 King 和 Levine (2001) 对金融生态的指标进行了阐释。R. C. N. Abma (2003) 用至少 25 年的数据检验了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说明了金融